

羅志田

百年前的清光緒三十一年（約1905），對中國而言真可以說是多事之秋。那一年發生了許多大事，有的當時就特別引人注意，如以中國為戰場的日俄戰爭，改變了世界對黃種人作戰能力的看法，也改變了東亞政治的權勢格局（而作為戰場主人的中國卻宣布了「局外中立」，更是世界歷史上少見的特例）；有的在當時許多人眼中可能不過是邊鄙小事，如同盟會的成立，後來才「認識到」實為轉變中國政治的重大契機，其在歷史言說中的作用復因「勝者王侯」的力量而進一步擴大。

同年發生的還有許多時人非常關注而後來的發展似不甚如人意的事，如北洋新陸軍據說耗銀百萬兩的首次實彈演習，固不免有人以為是勞民傷財過於浪費（早已成為近代史上腐敗誤國象徵的慈禧太后修頤和園，也不過挪用銀八百萬兩），但也讓許多人——特別是在華外國人——看到一個「尚武」中國的興起；如五大臣的出洋考察憲政，當時朝野均寄予厚望，後也成為史不絕書的要事，不過似乎成效不顯，致使後之史家敘此多帶遺憾惋惜，甚或潛受「敗者賊」向例的影響而視其為「欺騙」，多少輕忽了當事者基本誠懇的努力。

那一年的中國還發生了一件影響深遠的大事，就是實施至少千年以上的科舉制被廢除了。以前對科舉制尤其八股取士方式頗有微辭的嚴復在廢科舉的第二年說<sup>1</sup>：

甲午東方事起，以北洋精練而見敗於素所輕蔑之日本，於是天下愕眙，群起而求所以然之故，乃恍然於前此教育之無當，而集矢於數百年通用取士之經義。由是不及數年，而八股遂變為策論，詔天下遍立學堂。雖然，學堂立矣，辦之數年，又未見其效也，則嘩然謂科舉猶在，以此為梗。故策論之用，不及五年，而自唐末以來之制科又廢，意欲上之取人，下之進身，一切皆由學堂。不佞嘗謂，此事乃吾國數千年中莫大之舉動，言其重要，直無異古者之廢封建、開阡陌。造因如此，結果何如，非吾黨淺學微識者所敢妄道。

一般戰敗多往軍事及其相關方面尋找原因，而那時的中國人卻因打敗仗而舉國恍然於教育之無當，非常能體現「教而後戰」的傳統思路，其背後隱伏的則是長期貫徹於中國的政必須教、由教及政的基本原則，亦即嚴復那篇題為《論教育與國家之關係》的文章所欲探討者。

這在當年基本是通識，張之洞在《勸學篇·序》裏就說：「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裏在學。」乙巳年袁世凱等六疆臣要求立停科舉的奏摺也說，「普之勝法、日之勝俄，識者皆歸其功於小學校教師。即其他文明之邦，強盛之源，亦孰不基於學校」。中國之所以「相形見絀者，則以科舉不停，學校不廣」，故士心不堅，民智不開，難以進化日新。

欲補救時艱，必先停科舉以推廣學校<sup>2</sup>。這些封疆大吏的見解說明，嚴復關於眾皆以為戰爭取勝及國家強盛當歸功於學校的總結，大致不差。

那時舉國都帶有明顯的急迫情緒，六疆臣的會奏一則說「現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再則說「強鄰環伺，詎能我待」，便非常能體現出這樣的心態。實際上，在二世紀最初的幾年間，僅張之洞、袁世凱等人奏摺中關於改革科舉制所提出的辦法，幾乎是幾月一變，一變就躍進一大步；前摺所提議的措施尚未及實施，新的進一步建議已接踵而至。原擬用一年的時間逐步以學堂代科舉，而不過一年，便不能等待學堂制的成熟即一舉將科舉制徹底廢除了<sup>3</sup>。

如果從時人所論廢科舉興學校補救時艱進化日新的逐步遞進關係看，科舉制至少在負面已得到相當的重視。然而，這一制度更是一項集文化、教育、政治、社會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建制（institution），它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繫士人之耕讀，使整個社會處於一種循環的流動之中，在中國社會結構中起著重要的聯繫和中介作用。其廢除不啻給與其相關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約定俗成的習慣行為等都打上一個難以逆轉的句號，無疑是劃時代的。如果近代中國的確存在所謂「數千年未有的大變局」的話，則正如嚴復所說，科舉制的廢除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建制變動之一<sup>4</sup>。

嚴復已認識到這一變動和秦漢時的廢封建行郡縣和「車同軌」同樣重要，乃是「數千年中莫大之舉動」。當時朝野雖也存在反對廢科舉者以及相當數量的懷有疑慮者，但對於此舉的總體社會反應卻並不特別強烈，尤其是能夠影響所謂「輿論」的那部分「社會」並未表現出有力的讚譽和非議<sup>5</sup>。也許那時社會已興起一股以「起而行」取代「坐而言」的實幹風氣，故官紳均不遑空言而投身於辦新學堂的實際行動之中；但還有一種可能，即相當一部分士大夫已對朝廷失望，對其任何舉措皆淡漠處之。

魯迅即持後一看法，他曾說：「戊戌變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歲而有義和團之變，群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矣。」<sup>6</sup>這裏的「群」當然是指士大夫，因為一般的老百姓在義和團之時恰與清政府有一度的「合作」。清廷走向基層，從傳統的異端方面尋求力量和支持，多少提示著政府也接受中學之正統已不足以救亡的觀念，而在社會層面也不那麼依靠士人；反過來，對許多重視文野之辨的士人而言，啟用「子不語」的怪力亂神恐怕意味著朝廷之行為已類當年的洪、楊，一個明顯「失道」的朝廷自不足以救亡和振興中國<sup>7</sup>。

在中外競爭形勢危迫的情形下，朝廷與其主要支持者士人之間的互不信任恐怕是致命的。清廷不可恃的結論自然導致反滿革命的行為趨於「正當」，一些原來還希望政府能實行改革的士人開始轉向革命，章太炎就是個明顯的例證。更重要的是封疆大吏中出現了類似的傾向，庚子「東南互保」局面的出現，就是那些曾在清廷與太平天國之間選擇了前者的疆臣，後來卻在清廷與列強之間選擇了「中立」，而這些人中不少人恰又是廢科舉的積極推動者。

清廷啟用「神拳」是為了對付過於「跋扈」的外國，士人走向革命是因為清廷不能救亡，與「東南互保」一樣，多少都在針對外人在華存在（the 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這一近代新形勢。袁世凱等六疆臣的會奏明言，廢科舉也是對外國人有所交代<sup>8</sup>：

近數年來，各國盼我維新，勸我變法，每疑我拘牽舊習，譏我首鼠兩端。群懷不信之心，未改輕侮之意。轉瞬日俄和議一定，中國大局益危，斯時必有殊常之舉動，方足化群疑而消積侮。科舉夙為外人詬病，學堂最為新政大端，一旦毅然決然，舍其舊而新是謀，則風聲所樹，觀聽一傾，群且刮目相看，推誠相與。

日俄戰爭兩次出現在這一奏摺之中，說明這個與廢科舉大約同時的事件有力地刺激了許多中國人，推動或促進了一些人的改革要求。會奏試圖取信於外人，希望改變外人對中國的觀聽，以換得其「推誠相與」，與庚子年間的對外取向可謂截然相反，也提示出廢科舉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直接間接來自外國的影響和壓力。正如次年一份四川辦學綱要所說：中外「交通既久，幾於無事不與外人為緣」<sup>9</sup>。不過，外患的威脅和外部壓力雖大，廢科舉的主要動力應該還是來自內部。

或可以說，包括廢科舉在內的晚清新政有一致命的弱點，即政府終於認識到全面改革已是刻不容緩並主動推行自上而下的系列改革措施之日，卻正是大量那些過去維護朝廷的士人開始對政府失去信任之時。在士人心態與清廷政策頗有距離的情形下，改科考的不斷加速進行也反映出政府希望可以藉此挽回士人的支持。但恰由於改和革的一面不斷加速，而建設的一面未能跟隨，終造成舊建制已去而新建制更多僅存於紙面的現象。

袁世凱等人其實很清楚：「就目前而論，縱使科舉立停，學堂遍設，亦必須數年後人才始盛。」他們不過認為「如再遲至一年甫停科舉，學堂有遷延之勢，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須二三年後，始得多士之用」。為了使士人不存「僥倖得第之心」，民間放棄「觀望」心態以參與私立學堂的建設，故不能不立停科舉<sup>10</sup>。新學堂是否培養出「國家」所需的多士，確須從一二年以上的長程進行考察，甚或可以不必論清廷本身的存廢。但這些疆臣僅僅從培養人才的視角考慮科舉制的存廢，未能看到他們正倡導一項可能是「數千年中莫大之舉動」，其眼光確不能與嚴復相比。

而這些重臣不過是重複了嚴復前些年的看法，嚴氏在甲午後曾說，當時雖「言時務者，人人皆言變通學校，設學堂，講西學」，中國也未必就能在一年後收其益，蓋八股取士之「舊制尚存，而榮途未開」。故要「開民智，非講西學不可；欲講實學，非另立選舉之法，別開用人之塗，而廢八股、試帖、策論諸制科不可」<sup>11</sup>。那時嚴復似乎更多注重考試的方式和內容，庚子事變後他對科舉制度的存廢或有新的認識<sup>12</sup>，雖仍持開放觀望的態度，但已隱約感覺到某種不安，至少對此舉「結果何如」不甚樂觀。

的確，科舉制這樣一種基本建制的廢除，產生了涉及各層面的廣泛社會後果。即使僅從袁世凱等疆臣所關注的人才培養的視角看，新學制的教育成本就遠高於科舉體制下以民間為主的讀書系統，可能遠超出當時中國社會習慣的負荷。中國傳統政治基本是一個不特別主張「作為」的「小政府」模式，因「作為」方面的要求不高，故產生與此配合的輕徭薄賦政策，不提倡政府與民爭利，而教育體制也與此政治、稅收取向配套，大致符合以農業為主的生產方式，全毋需高投入。廢科舉當年《中外日報》的一篇文章便指出<sup>13</sup>：

中國之民素貧，而其識字之人所以尚不至絕無僅有者，則以讀書之值之廉也。考試之法，人蓄《四書合講》、《詩韻》並房行墨卷等數種，即可終身以之，由是而作狀元宰相不難。計其本，一金而已。以至少之數而挾至奢之望，故讀書者多也。

此文所見中國傳統教育投資甚低是個極其重要的因素，稍後候補內閣中書黃運藩也說：「科舉辦法，士子自少至壯，一切學費，皆量力自為，亦無一定成格，鄉間書塾，每省輒盈千萬，官所經營僅書院數區，修脯膏獎，率多地方自籌；少而易集，集即可以持久，無勞歲歲經營。」<sup>14</sup>正因耗費不多，所以才有「鄉間書塾，每省輒盈千萬」的可能。且黃運藩指出了另一值得注意之處，即鄉間書塾皆民間自辦，並不倚靠官力。新學堂就不同了，《中外

日報》的文章說<sup>15</sup>：

今一旦廢科舉而興學校，其所學者必科學也。一器之費千萬金，一師之俸數千金，此斷非數家之力所能及（此從鄉曲多數立論，非指少數之人與地也），不能不合一縣之力成之。而今之縣，稍有餘力，均已盡於賠款，蓋有欲興一小學堂而不可得者。即興一小學堂，而其力亦不足以養多人（所收學費不能不 倍於平時鄉塾之費）。即以官力助之，今之官力亦能有幾？

過去操辦地方蒙館（私塾是後起的稱呼，以對應於官立或公立的學堂）多為自願或半自願的私人事業，往往是創辦者多出資，而伴讀或借讀者所交束修多帶補充性質，貧富的負擔通常是有差別的；且還有宗族或地方的各類公田及「賓興」等民間建制，對貧寒而真能讀書者而言，上升性社會變動的機會始終存在。新式學堂較前花費大得多，特別是平白增添了可能是專職的管理人員，資金乃成大問題。更重要的是辦學已成集體甚或官方之事，由私向公的轉變使民間的積極性減弱，而就學者的花費理論上應是平均分攤的<sup>16</sup>，故貧寒而向學之家的子弟失學成為愈來愈普遍的現象<sup>17</sup>。

還在廢科舉前兩年，陳黻宸在和孫寶瑄論及張之洞提倡廢科舉時就說：「學校興辦不善，科舉豈可驟廢。科舉廢，天下更少讀書人矣！今之學校，非強有力者、廣通聲氣善鑽營者，往往不能入。此種學校何益天下？使並科舉廢之，而天下寒賤之士失望，將皆廢書不觀

矣。」<sup>18</sup>廢科舉後，舉人李蔚然也指出，科舉誠多弊端，但尚能「公平」對待貧富，而「今學堂學生，近城鎮者入之，僻遠不與；有勢力者入之，寒微不與」<sup>19</sup>。兩人皆觀察到新學制對貧寒之家的實際排斥現象，而李蔚然更看到了後來日漸明顯的城鄉差別。

廢科舉一個影響深遠的社會後果即中國的城鄉漸呈分離之勢。傳統中國士人以耕讀為標榜，多數人是在鄉間讀書，繼而到城市為官。舊制即使讀書做官，或候缺或丁憂或告老，讀書人多半要還鄉。新制則「學生」與城市的關聯愈來愈密切，而與鄉村日益疏遠；大學（早期包括中學）畢業基本在城市求職定居，甚至死後也安葬在城市，不像以前一樣要落葉歸根。前者當然不止是人員的流通，還意味著信息、資金等多渠道的流通，使整個社會處於一種循環的流動之中。後者實際意味著以前整個社會的循環流動在相當大程度上逐漸衰歇，並走向中止（這當然有個過程，且各地情形不一）。

入民國後，章太炎便指出：「自教育界發起智識階級名稱以後，隱然有城市鄉村之分。」所謂「智識階級」，其實就是新教育建制的產物。太炎更敏銳地認識到，由於「城市自居於智識階級地位，輕視鄉村」，進而產生了整體性的城鄉「文化之中梗」<sup>20</sup>。後來逐漸引起世人注意的讀書人之「脫離群眾」，部分即因傳統的耕讀生涯的中止所致；民初的讀書人學西人提出「到民間去」的口號，最是那時城鄉已分離的明證。

問題在於，所謂傳統中國政治從思想觀念到實際治理的方式都有其發生發展的統系，而且有其社會基礎。古代中國人以為，實際的政治管理必須在教化可及的基礎上，即賈誼所說的「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同時，由教及政的觀念也逐漸社會化，成為上升性社會變動的主要途徑。落實在體制上，就是從漢代發端到唐宋成熟的通過考試選官的科舉制，任何編戶齊民只要能通過一定層次的考試就可以擔任一定級別的官員，這樣一種「布衣卿相」的夢想曾經是四民之首的士和可望進入士階層的鄉村農業中產階級的持續追求，可以說是典型的「中國夢」<sup>21</sup>。



當然，科舉制的開放性很多時候是理想大於實際的；且隨著中式者的積累，獲得舉人以上的士人中也就只有一小部分人真能得官。但正如前引《中外日報》的文章所說，這樣明知有些僥倖的體制「足以相安千餘年而不見其不可終日者，則以若輩雖多終身不得之人，而要無日不有可得之理想，故其希望之心不絕。即此希望之心，彼乃借此以養生盡年，而得以悠遊卒歲矣」<sup>22</sup>。伴隨著不甚高之教育投入的是上升性社會變動的不絕希望，正是科舉制保障了這一夢想的持續，並以一定數量的成功範例鼓勵之。

我們切勿低估這樣一種體制保障帶來的社會後果，毛澤東在1930年以口述採集的方式進行了著名的「尋烏調查」，江西省尋烏縣的教育水平相當高，全縣識字率達百分之四，因女子基本不識字，男子識字率可能高達百分之八。到1930年時全縣雖僅有舉人一人，卻還有四百個秀才，即平均每千人中有秀才四個；且其分布相對較均衡：「南八區車頭鄉二千人中有秀才九人，也算是很多的；南八區龍圖鄉一千四百人中有秀才二個，則算是少的。」可知秀才多的地方也不過略高於平均數而已。這裏的新教育也有一定成效，全縣一萬人口中有初小學生五千人（5%）、高小學生八千人（8%）、中學生五百人、大學生三人，還有六個出洋學生<sup>23</sup>。

另一個湖南人楊開道在1927年曾說，中國「一百個農民裏頭，不過有五六個人能識字；至於受過普通教育的人，則不過一個二個罷了」，故「農村社會裏面的人民，多半沒有知識」<sup>24</sup>。楊開道是專門研究農村的社會學家，其說法與尋烏的現象相去太遠，那究竟應採信何者呢？一方面，應充分考慮中國的「地大物博」，尤其在公路和鐵路尚少、機動車僅為少數人使用的時代，各地情形可能很不一樣，區域性的差異和多樣化是非常實在的。另一方面，像楊氏這樣的留學生常常是據其所學的西方數據來認識和理解中國社會，故其所論未必具有代表性。

更接近實際的狀況或許是，像尋烏這類地處三省交界處的偏遠地區，一般或視其為「落後」的典型，但在大變動的時代，反可能是一個「禮失求諸野」的代表，即表現出那些交通更便利的地區一二十年前的狀況。也就是說，在很多鄉村，識字率雖未必低到百分之五六，但讀書人的數量日益減少、平均識字率逐漸降低應該是一個相對普遍的傾向。

早在廢科舉當年，前引《中外日報》的文章便認為：「廢科舉設學堂之後，恐中國識字之人必至銳減。而其效果，將使鄉曲之中，並稍識高頭講章之理之人而亦無之。遂使風俗更加敗壞，而吏治亦愈不易言。」<sup>25</sup>隨著「布衣卿相」夢想的保障不再，而新式教育的投入又日益昂貴，鄉村中讀書的願望減低，而讀書的代價則增高。且傳統教育不僅投資極低，其「應用」亦甚廣，低層讀書人至少可以留在本地任塾師或從事一些地方事務。而新學制不僅教育成本激增，產出之學生卻多顯得「無用」。山西五台縣永興村的鄉民即說<sup>26</sup>：

民國的書房，真是討厭！娃們念的書，今年這樣，明年那樣，換的真熱鬧，也不見念成一個。看人家前清時候，書房裏念的書，不只是哥哥念了兄弟還能念，就是爹爹念了兒還能念，爺爺念了孫子還能念哩。書老不換，人家還進秀才、中舉人；現在書倒換的勤，也不見念成一個呀！

胡適剛從美國回來時就注意到：「如今中學堂畢業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種無能的遊民。這都由於學校裏所教的功課，和社會上的需要毫無關涉。」<sup>27</sup>且不論胡適所說的原因是否對，他的確抓住了社會對此類中學生需求有限這個關鍵。如果一個中學生

甚麼都不能做（有些事或亦其不願做），便不能不追求更高的學歷或到外頭去討生活<sup>28</sup>。楊開道就觀察到，一方面是農村最缺「領袖人才」，而鄉村讀書人向城市浮動已成「普通潮流」：

一般有知識的人，能作領袖的人，都厭惡農村生活，都拋棄農村生活到城市裏去。農村社會費了金錢來教育他們的優秀份子，本想他們來作農村社會的領袖，來作農村社會的改造者；但是他們放棄了他們的責任跑了，剩下一班沒有知識的農民，教他們怎麼樣能改善他們的生活？

他認為，「農民缺乏知識，是我國農村生活衰落的一個主要原因」；故「一班優秀份子不應該跟著普通潮流，去過城市的生活，而厭棄農村生活」，反而應該「到農村社會去服務」<sup>29</sup>。

其實胡適看到的恐怕更多是中學生已進入城市的情形，說明城市實際也未必「需要」和接納他們，而新式大學的花費又不是一般家庭所能支付的。到1932年11月，《申報月刊》組織上海一些教育家舉行以「今日青年的煩悶與出路」為題的講談會，江蘇省立教育學院教授俞慶棠就說<sup>30</sup>：

青年的職業，不應該專向城市裏去找。因為城市裏面粥少僧多，時鬧失業恐慌；青年要在城市裏找職業，恐有登天之難。近年來我國鄉村的衰落及離村問題極為嚴重，我們希望城市裏的青年們應該回到鄉村裏邊去，作歸農運動，幫助農民改造鄉村，建設鄉村。

俞氏提出的一些具體建議雖然充滿城市人對農民和鄉村的想像<sup>31</sup>，但其注意到的「離村問題」確實存在，而且這個問題 幾年前就引起了李大釗的注意，他那時就看到「中國農村的黑暗，算是達於極點」。究其緣故，則「都是因為一般知識階級的青年，跑在都市上，求得一知半解，就專想在都市上活動，都不願回到田園；專想在官僚中討生活，卻不願再去工作。久而久之，青年常在都市中混的，都成了鬼蜮。農村中絕不見知識階級的足跡，也就成了地獄。」<sup>32</sup>

注意李大釗觀察到的「受害者」是雙向的，常在都市中混的知識青年固然成了「鬼蜮」，而失去知識階級的農村也變成了「地獄」。兩者都極大地影響了中國的發展，特別是雙方的結合為後來中國的政治革命提供了最主要的人力資源。

《漢書·食貨志》曾將四民社會中的「士」界定為「學以居位曰士」。這裏的「位」當然包括士向「大夫」的發展路向，同時也意味著士在基層社會中的核心地位。鄭振鐸以為：中國傳統的「治人階級」分為直接統治者（約指皇帝）和「幫治者階級」，後者便是士人<sup>33</sup>。從孔子以來，中國士人最嚮往的政治模式可以說是一種士治的「民主」，有新觀念武裝的蔣夢麟表述為「民有，士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scholars, for the people）；其實以前的士人不太會想到「民有」，故更實際的理想型狀況大約是「王有，士治，民享」（of the emperors, by the scholars, for the people）。這不僅因為各級「大夫」多從士來，由於小政府的傳統，基層地方大多在官督之下實行自治，起著關鍵作用的鄉紳之核心成分就是士人，故「士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相當實際的。

科舉制廢除的一個重要社會後果即鄉村中士與紳的疏離。隨著「鄉紳」的來源逐漸改變，讀書人在其中的比例下降，基層的「士治」可能變為新型的「紳治」。其實，廢科舉不過是二

世紀一系列「斯文掃地」活動的開端。「鄉紳」與「知識」的疏遠可能意味著相應的道義約束日減，容易出現所謂「土豪劣紳」。不過，當鄉村社會的斯文掃地漸成定式之時，各類新型的鄉紳也會成長起來，其中固然包括使鄉村「黑暗」的劣紳，也會產生出一些不代表「斯文」但行使著傳統鄉紳之基本正面功能的人，例如「修橋補路」一類社區事務的組織（通常也包括民間信仰方面的組織）。總之，在整個世紀的系列斯文掃地活動之後，鄉村既遭受了疏離於「知識」的痛苦，也開始真正嘗試一種無土的自治生活。

\* 本文是 數千年中大舉動：廢科舉與鄉村中士與紳的疏離 一文其中一節的縮略本，很希望能藉此聽到一些先期的指教。

## 註釋

- 1 嚴復：《論教育與國家之關係》（1906年），載王栻主編：《嚴復集》，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166。
- 2 本段與下段：袁世凱等：《奏請立停科舉推廣學校摺》（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初二），載《故宮文獻特刊第一集·袁世凱奏摺專輯》，第七冊（台北：故宮博物院，1970），頁1991-92。上奏者包括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盛京將軍趙爾巽、湖廣總督張之洞、署兩江總督周馥、署兩廣總督岑春煊及湖南巡撫端方。
- 3 參見王德昭：《清代科舉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236-45。
- 4 參見羅志田：《中國文化體系之中的傳統中國政治統治》，《戰略與管理》，1996年3期，頁45-51；《科舉制的廢除與四民社會的解體——一個內地鄉紳眼中的近代社會變遷》，《清華學報》（新竹），新第二五卷第四期（1995年12月），頁137-60；《清季科舉制改革的社會影響》，《中國社會科學》，1998年第4期，頁185-96。
- 5 在鄉間則不然，喜憂皆甚明顯，將國家和個人前途寄望於科舉制的山西舉人劉大鵬獲悉停科考的消息，即感「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屬空虛，無一可以垂之永久」；而同鄉的趨新者卻都「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舊制變更如此，其要天下之治，不日可望。』」參見劉大鵬著，喬志強標註：《退想齋日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頁146、149。
- 6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載《魯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頁282。
- 7 參見羅志田：《裂變中的傳承：二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17-19。
- 8 袁世凱等：《奏請立停科舉推廣學校摺》，載《袁世凱奏摺專輯》，第七冊，頁1991。
- 9 四川奏定致用學堂辦法綱要，《北洋學報》，丙午年（1906）第二冊，學界紀要，頁1。
- 10 同註8，頁1991。
- 11 嚴復：《原強修訂稿》（1896年），載《嚴復集》，第一冊，頁30。
- 12 庚子事變可能改變了嚴復的一些看法，他稍後曾說：「中國自甲午中東一役，而情實露；自庚子內訌，而情實愈益露。」參見嚴復：《主客平議》（1902年），載《嚴復集》，第一冊，頁115。按當年事起於朝廷啟用義和團攻使館，後更有八國聯軍的入侵，而嚴復視其為「內訌」，聯繫到事變中他曾避難於上海，恐怕他對「東南互保」之局還有一般人較少注意的見解，詳另文。
- 13 論廢科舉後補救之法，《中外日報》，乙巳年（1905）八月二日，錄在《東方雜誌》，第二年第 一期（光緒三十一年一月），頁253（欄頁）。
- 14 候補內閣中書黃運藩請變通學務、科舉與科學並行、中學與西才分造呈，載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982。

- 15 同註13，頁253（欄頁）。
- 16 只有在民間調適力量較強的鄉村社會或仍可調劑之，如民初山西五台縣永興村的學費便「仍照舊例，按貧富出錢。先規定某年級若干，次以貧富增減之」。其「學費多寡，由村長、學董所定」。學生家庭「較豐者出三四元，貧寒者一元上下」。參見馬儒行：《述吾鄉之小學教育及民眾教育——山西五台縣永興村二餘年來之新教育》，《鄉治》，第二卷第二期（1931年6月18日），頁2。但這主要取決於當地民間的社會調適力量，各地差距可以甚大，有較強的偶然性。
- 17 這個問題牽涉甚廣，後面還會簡單提到，當另文專論。
- 18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三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700-701。
- 19 舉人李蔚然請變通整頓學務呈，載《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下冊，頁985。
- 20 章太炎：《在長沙晨光學校演說》（1925年10月），轉引自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823。
- 21 布衣卿相的夢想常常更簡單也更理想化地表述為「耕讀」，反映出農耕是以「衣冠禮樂」為表徵的整體性華夏「聲教」的最重要基礎。即使在通常被納入華夏文化圈的東南，在農耕非主要生產方式的一些沿海地帶，其上升性社會變動的選擇就比通常嚮往的「耕讀」要寬，似乎也不時伴隨著比一般農耕區域更強的怪力亂神成分，詳另文。
- 22 同註13。頁251-52（欄頁）。
- 23 毛澤東：《尋烏調查》（1930年），載《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頁159-63。關於男子識字率是採信毛澤東文字表述得出的比例，不排除他可能有筆誤，若是那樣，百分之四僅指男子的識字率。
- 24 楊開道：《我國農村生活衰落的原因和解救的方法》，《東方雜誌》，第二四卷第六號（1927年8月25日），頁5-13。
- 25 同註13，頁252（欄頁）。
- 26 馬儒行：《述吾鄉之小學教育及民眾教育》，《鄉治》，第二卷第二期，頁1。
- 27 胡適：《歸國雜感》，載《胡適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0），卷四，頁10。
- 28 此點承王汎森兄提示。
- 29 同註24。
- 30 今日青年的煩悶與出路，《申報月刊》，第二卷第一號（1933年1月），頁53。
- 31 如她希望青年到鄉村去「作農民的喉舌，說農民心裏要說而達不出的話；作農民的手腦，介紹科學方法，減少農民的勞作；作農民的耳目，將國內外各種問題傳遞給農民，使農民知道怎樣去應付。一方面鄉村情願願的供給青年生活上的需要，同時鄉村可以得到許多進步」（同上註）。
- 32 李大釗：《青年與農村》（1919年2月），載李大釗研究會編：《李大釗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288-89。
- 33 鄭振鐸：《且慢談所謂「國學」》，《小說月報》，第二卷第一號（1929年1月），頁10。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刊文字或圖片，必須先獲本刊書面許可。